

政策工具视域下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的 政策取向与特征分析

周敏 马早明

[摘要]马来西亚发布数字化发展战略(Malaysia Digital),培养数字时代急需的专技人才,将成为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变革的新使命。政策工具视域下,命令性工具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提供动力支撑,激励性工具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提供资源保障,能力建设工具为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建设创设制度环境,系统变革工具为完善区域一体化管理体系形成机制保障。从具体特征来看,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主要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以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形成建设标准,以“数字+教育”融合方式拓展职业教育领域,以数字人才培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关键词]职业教育;马来西亚;教育数字化;政策工具

[作者简介]周敏(1991-),女,湖南怀化人,岭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在读博士。(广东 湛江 524048)马早明(1966-),男,安徽枞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东帝汶研究中心/国家民委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广东 广州 51063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东南亚地区教育战略行动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MIC-YJC-2022012)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1-0076-0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3.11.006

一、前言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教育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创新,推动教育流程再造、结构重组和文化重构,改变教育发展动力结构,促进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变革,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个性化发展。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学生赋能》。同年,欧盟发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都是倡议积极推动教育

向数字化转型,以促进教育公平。2022年,马来西亚正式发布一项国家级数字战略 Malaysia Digital 计划(简称 MD),特别提出“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力资源”。从我国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数字中国”,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关键举措。为此,本研究拟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分析框架,以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变革的历程为研究对象,聚焦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政策变革的逻辑,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二、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分析的理论工具

马来西亚国家级数字化战略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实现的,政策工具间的排列与组合往往是国家决策者理念的现实反映。政策工具是影响政策过程以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的任何事物,它既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又是政策目标与结果之间的桥梁。

(一)政策工具理论的适切性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这一概念源起于社会学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扩展到教育政策领域。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一是根据政策工具产生着力面和市场运行规律,Rothwell等将其分为供给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二是依据政策工具对目标人群的影响,麦克唐纳尔(McDonnell)等将其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性工具、组织建设性工具;三是根据政府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加拿大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M.Howlett and M.Ramesh)将政府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国内学者的研究,一是依据使用方式,顾建光等将政策工具划分为管制类、激励类和信息传递类三种;二是依据政府管理,陈振明将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三是基于中国教育政策的全过程理论并参照麦克唐纳尔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薛二勇等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引导性工具、能力建设性工具和组织建设性工具;四是基于高等教育政策目标,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分类基础上,赵宏等增加了引导型政策工具;五是参照Rothwell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段尧清等将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工具、需求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适切的政策工具可以有效地解释国家教育政策的实施缘由和实施目标,本文主要运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政策工具理论对马来西亚职业

教育数字化政策进行分析。

(二)政策工具视域下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演变的逻辑结构

政策工具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体系,但理论的真正依据来自政府目标。本文试图从理论形成过程、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三个维度,形成对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变革的系统性认识,从而在政策取向研究中发挥作用。

1. 理论逻辑: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理论协同。随着后疫情和数字经济的大发展,马来西亚已然意识到推出惠及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马来西亚在国家级数字战略中特别提出“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力资源”。“数字教育学习计划2.0”计划推动数字教育转型,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二是职业教育对学生数字素养培养具有重要影响。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可以分为高中起点和初中起点。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要取得良好的数字人才培养效果,就必须依据国家数字战略,抓住机遇实现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共教育,职业教育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增长和数字素养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政府能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直接和显性的影响,政策则可以通过具体实施掌控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二者统一是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前提,也是马来西亚政府遵循政策工具理论的实践方式。马来西亚职业教育转型还在发展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案例,需要通过多方主体协同,并给予正确的政策引导。

2. 实践逻辑: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主体协同。首先,数字化重塑社会运行方式。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是建立在培养数字化专业技能人才基础上的主体协同。从马来西亚政府提出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50)和“经济转型计划”用以改变疲软的经济状态,主动为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可以看出,近年来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取得的发展成效都是在贯彻培养人才的数字素养这

一根本任务下实现的。其次,发展“新经济模式”。数字时代需要“新经济模式”以满足国际经济需求。马来西亚经济一直在经历快速转型,当经济市场从本地转移至全球,国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设法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素质。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需求,在第二次政府倡议中马来西亚提出“新经济模式”,强调“发展人的素质”,要为解决数字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和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条件保障。最后,职业教育要有新作为。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历来注重业界与教育的结合。一方面,企业应以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如及时反馈用人需求,提供实际教学材料、为学生提供实践实训机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学校不仅要专注于人才的技术培训,还要强调学生软实力的发展、注重现实问题的教学,实现专业人才对口反哺社会。

3. 价值逻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共识。教育政策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技术革新息息相关。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加速催生了新的数字技术,促使传统实体企业移师线上,数以百万计的马来西亚人的日常互动正以虚拟方式进行。第一,数字化影响市场对人才的定位。数字技术时代需要重新思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重新思考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转变。技术变革促进人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呈现新的方式,数字化对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提出全新要求,数字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为此,未来职业教育要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数字技能人才。第二,数字技术引发传统教育方式的变革。数字化的到来改变了学生学的方式、教师教的方式和学校管理的方式,呈现出自主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一方面,利用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线共享,让学生具备问题意识、有求知求真的愿望;另一方面,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学校数字管理服务能力,

通过数字化设计实操问题的解决方案、创造原型,最大限度拓展学生的学习场域和学习视野,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提供技术支撑。第三,政策支持的优势在于提供条件保障。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念下开展政策工具研究,是实现共同价值追求的必然路径,既满足数字化背景下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的育人需求,也符合数字时代马来西亚国家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政策导向。

三、政策工具视域下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取向

国家层面的政策发布体现了马来西亚政府对本国职业教育转型期望的迫切程度,以下12份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见下页表1)基本反映了马来西亚职业教育的变革历程。特别是近几年以数字化转型为变革重点,体现了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强烈愿望。

(一) 命令性工具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提供动力支撑

命令性工具的核心是指政府强制性权威要求。马来西亚的职业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由政府驱动和主导。但是随着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与不断修订,企业开始关注到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并创建自己的培训机构,政府也逐渐尝试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可见,通过职业教育政策变革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是职业教育发展获益于政策引导的重要表现。

1. 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实现政企合作。为了解决因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及数字技术人力不足导致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等问题,马来西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进行了整合。马来西亚有多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一是由纯粹政府提供的模式,在没有工业的偏远地区,产业没有办法创建培训机构,需要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来培训年轻人;二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模式,在企业发展成熟的地区,实习培

表1 2005—2022年马来西亚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文本

编号	名称	发文时间	要求
1	《2006年国家技能发展法令》	2005年	要求所有职业教育专业必须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框架下,设立课程管理指南和标准
2	《马来西亚第九个五年计划》	2006年	推出了开放入学和远程教育政策
3	《职业教育转型》	2010年	推行基础职业教育试点项目,规定在普通中学开办技术与职业教育班,让非学历教育的初中生学习基础职业技能
4	《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	2012年	报告将职业教育放在国家教育的重要位置并提出多项改革措施,提出将职业高中改成职业学院
5	《2015—2025 马来西亚教育蓝图》	2015年	重点通过再培训和提高技能来提供终身学习机会,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
6	《马来西亚第十一个国家计划(2016—2020)》	2015	提出马来西亚将为社会提供15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有60%需要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相关技能
7	《2016—2020年马来西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16年	重点放在提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群体的高等教育参与比例
8	高等教育4.0计划	2018年	聚焦于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有能力和技能的劳动力
9	《社区学院与理工学院策略计划2018—2025》	2018年	突出以企业和社区需求为职业培训发展目标
10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灵活学习途径:平衡人力资源开发和公平政策》	2021年	针对马来西亚教育系统发展现状提出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教学,支持灵活学习途径的实施
11	《国家级数字战略—Malaysia Digital 计划》	2022年	特别提出“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力资源”
12	《数字教育学习计划2.0》	2022年	为了推动数字教育转型,教育部将推展更具有互动特性的马来西亚数字教育学习计划2.0

训由企业创办管理完成,企业可以自主设置课程标准;三是混合模式,即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从长远来看,政府希望朝着产业驱动的方向发展。

2. 发挥政府职能,改变职业教育的不良印象,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一是政府释放信号。2020年底,马来西亚成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理事会,称要“改变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传

统看法”,强调由行业领导机构来设定基调和参数,为政府提供建议和决策。二是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是企业的责任。政府通过让企业缴纳基金,促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通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为普通民众提供平等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例如,在《马来西亚第十一个国家计划(2016—2020)》中提到马来西亚将为社会提供15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有60%的岗位需要有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相关技能。三是政府设立职业培训、终身学习计划以及奖励措施,为职业教育人才劳动技术的提升提供路径,让职业教育成为吸引学生的事业途径之一,解决人才供需错配问题。

3. 列入重点任务,以国家级数字战略为指引,培育数字技能专业人才。一是将职业教育发展作为重点任务纳入政府工作。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可以促进职业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可以更好地实现个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政府要完善政策法规,加强质量监管和过程保

障,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二是马来西亚国家级数字战略中特别提出“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力资源”。随着马来西亚数字化进程的明显加快,马来西亚历年来依赖初级产业和廉价劳动力的模式已无法实现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三是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快速发展、建成现代化工业国家愿景不相匹配。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意识到推出

惠及数字经济的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加大投入到培训认证计划、实习生培训计划以及提供网络实验室设备等,助力培养更多数字化人才。

(二) 激励性工具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提供资源保障

激励性工具的核心是促使短期资源的调整。后疫情和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加快了世界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政府工作重心和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发展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将主要教育资源投入收益更多的专业领域,体现出人才导向、质量优先和公平导向的价值取向。

1. 人才导向,更新职业教育观念。数字化视域下的世界各国对人才的竞争越发激烈,职业教育政策以“数字人才培养”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日渐清晰。一是承认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两种不同类型教育,但是上升通道是一样的,缩小普职教育的差距;二是灵活地为特定资格范围内的不同组合路线提供便捷的选择途径,提高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的一致性;三是加强不同机构和部门的合作,支持学习者进行终身学习。在数字时代,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人才导向是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政策的重要激励工具。

2. 质量优先,逐步转向员工权益。一是将企业引进来,通过行业领导机构来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最大限度保证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二是马来西亚要求每家企业缴纳基金,同时要求企业把员工送去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如果雇主不提供培训,员工就会逐渐流失。从政府角度来看,员工流失只会去另一家企业,在这个人力资源流动的过程中国家经济总体是受益的。

3. 公平导向,扩大职业教育权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议程”,明确提出“确保所有人平等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性工具指导下的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政策更加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职业

教育发展趋势,教育内容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匮乏的领域,为有身体或者智力障碍的学生提供技能培训和工作机会,进一步体现教育公平。

(三) 能力建设工具为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建设创设制度环境

能力建设工具的核心加强长期投资。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政策实施呈现出从多元主体监管转向设立专门机构,逐渐向职业教育科学化建设转变,呈现出规范性、制度化的特点。为了回应数字经济时代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确保职业教育政策的长期性和延续性,消除多元管理主体带来的不良后果,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政策在实施上有所转向。

1. 设立专门机构,提高管理效率。政府内部涉及职业教育的部门较多,通过成立“职业教育内阁委员会”来协调政策。设立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一是协调供给侧,二是确保需求侧。此前,为马来西亚为大学和职业院校提供认证的是两家不同的机构,两个机构认证方向不统一,但为大学提供认证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职业教育认证。为了消除这种互相影响,政府设立统一认证框架。目前,两个认证机构被整合在一个框架内工作,该框架可以确保双方的认证可以互认。

2. 完善监管机制,加强三方合作。一是完善的监管机制是促进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政府通过加大监管力度来改善马来西亚职业培训机构组织混杂和学生学历认证质量难以保证的现状。二是亟须加强政府、学校和企业三方合作,做到信息同步,实现供需接轨。一方面,在原有政策模式下,众多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和实际社会需求脱轨,毕业生面临就业难、就业层次低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学习的知识技能陈旧,往往不能满足企业用人需要,导致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这也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社会认同度低的原因之一。

3.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

力。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的动力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自马来西亚进行国际职业教育合作以来,职业教育一方面起到彰显国家实力,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起到顺应“一带一路”共建倡议等国际形势新变化,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因此,变革后的政策能否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国际影响力成为政策评价的标准之一。

(四)系统变革工具为完善区域一体化管理体系形成机制保障

系统变革工具的核心是权力调整,体现这一政策工具要以马来西亚资格框架(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MQF)为主。MQF是关于职业资格及其与教育体系相关的质量声明,于2007年首次发布,2011年开始实施。修订的MQF第二版于2017年12月获得MQA理事会会议批准。修订主要侧重于重组和加强MQF学习成果,并将技能、职业和技术部门整合到一个部门,即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VET)部门。

1. 统一职业技能标准,实现不同证书文凭的资格互认。作为东南亚最早建立国家资历框架的国家,马来西亚借鉴英国国家职业资格制度(NVQ)建立了五级技能标准。MQF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确保资格标准和加强质量保证政策;二是促进资格命名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三是为资格的进展或相互关系提供保障机制,包括非学位和学位的资格。通过MQF形成一个参照体系,使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构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统一在国家资格框架之下,实现不同类型的证书、文凭所代表的资格互认。

2. 缩小普职差距,提供均等发展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资格框架的制定已被视为提高学习、技能和能力以支持国家政策和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培养高素质公民和高技能劳动力。修订后的MQF在缩小普职差距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即为高等教育和培训部门的所有资格制定资格标准。马来西亚让每个接受职业教育的學生获得与普通教育学生同等的职业发展机会,根据MQF制定的教育发展路径,获得马来西亚“高级文凭”的学生还可以到高等学校继续求学并有机会获得学士学位。

3. 消除普职感知差距,促进终身学习。修订后的MQF希望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潜力,尽可能消除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在质量、标准、相关性和严谨性等方面的感知差距,并最终在两者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推动终身学习,这种关系构成了2.0版MQF的发展核心。

四、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工具的特征分析

职业教育走向数字化转型,是职业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职业教育发展内生力的体现。近年来,马来西亚致力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工具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

1. 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数字化战略行动速度。马来西亚国家级数字战略(Malaysia Digital)正式出台以前,两项举措在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马来西亚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地位。通过颁布《2006年国家技能发展法令》要求所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标准必须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National Occupational Skills Standards)的框架下进行,以保障职业教育与培训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职业教育变革确定发展思路和建设蓝图。二是在《2013年—2025年教育蓝图》中提出“职业转型计划”,提出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举措有学徒制、实践培训、实际模拟及雇主专门培训。前者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后者标志着职业教育转型正式开启。

2. 抓住数字化发展时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早已率先抢占数字化发展时机,加大国家投入用于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资源开发,并将其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行动领域。”马来西亚完善自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网络类数字基础设施,为吸引职业教育合作国家创设优质的基础条件。

3. 缩小数字鸿沟,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数字基础设施。目前来看,马来西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居于东盟前列,其在利用马来西亚已有成果和吸收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积极参与同周边国家、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以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形成建设标准

1. 明确建设标准。一方面,马来西亚国家资历框架对标国际建设标准,在统一国家认证标准的大前提下,分级分类进行资格认证;另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标准,完善区域标准的建设,实现教育系统与行业各界的良好沟通。

2. 找准建设目标。一方面,国家资历框架的建立可以完成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历框架对接,实现区域内文凭技能的互认与转化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国家资历框架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深化。随着东盟共同体的日益紧密,资历框架体系的统一将助力合作走深走实。

3. 深化建成意义。一方面,马来西亚资历框架体系持续完善有利于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整合东盟各成员国资历框架标准的基础上,构建东盟区域资格认证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才高质量流动和职业教育合作。

(三)以“数字+教育”融合方式拓展职业教育领域

1. 实现教学方式数字化。数字化教育打破

传统校园的局限,让教学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面授方式传播知识,还可以通过网络让学生接受线上教育,实现教育和学习活动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参考马来西亚教育部推出的“数字教育学习计划2.0”,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学生和教师在使用时更具趣味性和互动性。为此,数字化教育除了配备校园网络、多媒体等教学设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建设数字化、仿真化的虚拟实践场域。

2. 实现教学资源数字化。在硬件方面,马来西亚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起“国家一省市一地方”三级教学资源数据库。在软件方面,充分依托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建设智慧教室、智慧校园。通过有效利用职业教育数字化的优质教学资源,构建“科技+教育”融合的课程体系。

3. 实现教学管理智能化。数字化极大地突破时间和空间对教育的限制,同时也给传统教学管理方式带来了挑战。一是建设一体化智能管理与服务平台,使数字信息技术和学校管理深度融合;二是加大实时教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将数字化管理融入治校理教全过程;三是打破学校边界,利用和扩大数字化技术在优化教育服务管理上的优势,为师生打造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故而推动学校教学管理从传统的“经验治理”走向更加智能的“智慧治理”。

(四)以数字人才培养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1. 找准着力点,提升人才培养的数字素养。严苛的国际环境对人力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各国重视人力资源的培养,特别是数字技能人力资本的培养。马来西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目的是满足行业需求并促进经济增长,与全球化、知识型经济、技术进步和全球劳动力流动保持一致,现在马来西亚有500多所公立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构为所有教育层次提供各种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课程。

2. 明确发展痛点,重视数字技能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供需不对等和人岗不匹配,成为制约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发展的痛点。在数字时代,表现为数字技能人才缺口大,学用一致难以协调。随着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相关产业对数字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短缺一直束缚着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据人力资源部统计,在生产、农业和建筑业的人力资源短缺就达70万人。2019年以来,马来西亚各行业对数字技能的需求均有所增加,数字化领域人才差距将进一步加大区域间数字发展不平衡现象。因此,不仅需要掌握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更需要用数字化的理念审视和指导职业教育政策变革过程的各个环节。

3. 抓住关键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一是要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升级,拓展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视域,积极重塑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新生态。二是促进马来西亚职业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教学带来全新体验,数字技术让教学无处不在,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带来全新体验。三是马来西亚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努力实现人岗匹配,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主要表现为以“需求驱动”进行政策制度体系更新,以此培养出适配度高的数字技能人才。

五、结语

利用政策工具理论对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取向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不仅是该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度的完善,更是为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而进行的全方位政策制度体系更新。目前,马来西亚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也存在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不均衡、职业教育族群两极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政策实施上仍存在无法落地的情况;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发展产生的新变化会不断对职

业教育提出新挑战,不断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政策将是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监管和引导。2022年8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政府把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不断加大政策供给、创新制度设计,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多元办学格局和现代治理体系。当前,我国主要是从政策供给、制度设计等层面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我国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也将面临转型与重塑。为此,中马两国可以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机,把握数字技术优势为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带来的机遇。[5]

[参考文献]

- [1]本刊编辑部.把握数字化契机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3):5-11.
-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3]高晟星,陶丽萍.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内涵、演进与关键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2(13):42-47.
- [4]李思敏,施雨丹.迈向2.0版本时代:马来西亚国家资历框架转型升级研究[J].比较教育学报,2022(2):16-31.
- [5]马应心,宋霁,夏琪.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中马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启示[J].德州学院学报,2021,37(1):10-13.
- [6]徐向梅.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N].经济日报,2022-09-09(11).
- [7]Economic Planning Unit,Prime Minister Is Department.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Blueprint[R].Feder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entre,2021.
- [8]Economic Planning Unit.The Eleventh Malaysia Plan,2016-2020[R].Putrajaya: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2015.

(栏目编辑:袁慧)